

陈志贵著



「唐帝列传」

唐太宗 皇 帝 传

下册



吉林文史出版社

K827=421/1

唐帝列传

唐太宗

(下)

陈志贵 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690062

吉林文史出版社

RBA72/0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太宗/陈志贵著. -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4

(皇帝丛书·唐帝列传)

ISBN 7 - 80626 - 034 - X

I . 唐… II . 陈… III . 李世民(599 ~ 649) - 传记

IV . K827 = 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2140 号

唐太宗

作 者:陈志贵

责任编辑:邱莲梅 吴 燕

封面设计:正典书装

出 版:吉林文史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顺义康华福利印刷厂

开 本:850 × 1168 毫米 大 32 开

字 数:388 千字

印 张:18.5

版 次: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04 年 11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 - 80626 - 034 - X/K · 29

定 价:41.80 元(上、下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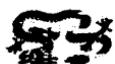


目 录

第一章 贵族子弟,弓马少年	1
第一节 贵族世家的子弟	1
第二节 弓马少年	6
第二章 起兵晋阳,定鼎关中	15
第一节 晋阳起兵	15
第二节 西入关中,建立大唐	26
第三章 扫除割据,实现统一	36
第一节 夺陇右,克代北	36
第二节 攻河南,战河北	45
第四章 玄武门之变	58
第一节 唐初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发生与发展	58
第二节 东宫与秦王府对垒	72
第三节 夺权之争的流血事变	80
第五章 稳定皇位的措施	88
第一节 妥善处理政变后的遗留问题	89
第二节 稳定山东地区	96
第三节 调整最高决策集团	104
第六章 贞观治世	112
第一节 休养生息政策	113
第二节 举贤任能,纳言求谏	126
第三节 改革隋制,发展与完善封建政治	150



第四节 “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 的礼法并用政策	175
第五节 汉“胡、越一家”的民族政策	194
第六节 誉满世界,楷模后世的发展文化政策	222
第七节 贞观时期的佛教、道教与政治	244
第八节 世界文化交流的中心	263
第七章 铸成贞观治世的条件	303
第一节 唐太宗的才智与品格	303
第二节 治国安邦的人才群体	315
第三节 思想观念的统一和人际关系的调整	359
第四节 现实政策为贞观之治增添了活力	390
第八章 唐太宗的晚年与贞观治世的衰落	408
第一节 过早的衰老和群僚素质的退化	408
第二节 严酷多变的贞观十七年	427
第三节 内耗加速了贞观治世的衰落	449
附 录 唐太宗生平大事年表	487
后 记	513



第七章 铸成贞观治世的条件

第一节 唐太宗的才智与品格

在中国古代封建帝王中，唐太宗堪称佼佼者。历代，特别是唐代封建史家以及一些政治家、思想家、诗人等，关于唐太宗的政绩，发表过许多见解。他们的评论，往往带有溢美之辞，但也确实道出了唐太宗的一些特点。

唐玄宗朝，史学家吴兢编撰了一部重要文献《贞观政要》，这是一部封建政治的教科书。在其《序言》中，吴兢第一次对唐太宗的历史地位作了这样的评价：

“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
……庶乎有国有家者克遵前轨，择善而从，则可久之业
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岂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
已哉！”

这里，极力美化唐太宗的“仁政”，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里，这个评价可谓极高了。

随着《贞观政要》的流传，唐太宗更成为封建帝王的楷模。例如，唐宪宗即位之初，“读列圣实录，见贞观、开元故事，竦慕不能释卷”^①，决心像唐太宗那样理政。又如，唐文宗

^① 《旧唐书》第15卷《宪宗纪·史臣曰》，《二十五史》5，第64页。



“在藩时，喜读《贞观政要》，每见太宗孜孜政道，有意于兹。”^①再如，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年），雅好儒士，留心贡举，采纳众议，“当时以大中之政有贞观之风焉。”^②这种把太宗视为封建帝王楷模的认识，直到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明代史学家朱翌对唐太宗就高度评价说：“自三代而下，创业守文之君，兼之者唯唐太宗，汉之文、景、武、宣，皆不及也。”^③

至于一般士人是怎样评论唐太宗的呢？唐代不少著名诗人在自己的诗篇里，吐露了对唐太宗的仰慕之情。诗圣杜甫曾多次到昭陵访古，写下了一些诗篇，其中说：“草昧英雄起，讴歌历数归。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翼亮贞文德，丕承戢武威。圣图天广大，宗祀日光辉。”^④又在另一首因目睹安史之乱，而向往贞观治世的诗中写道：“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⑤刘禹锡不仅注意到唐初的武功，而且特别赞美唐太宗的“偃武修文”措施。“惟唐以神武定天下，群慝既蕪，驟示以文。韶英之音与钲鼓相袭。故起文章为大臣者，魏文贞以谏诤显，马高唐以智略奋，岑江陵以润色闻，无草昧汗马之劳，而任遇在功臣上。唐之贵文至矣哉！”^⑥这里揭示了贞观时期用人致治的道理。白居易作《新乐府》歌颂唐太宗：“太宗十八举义兵，白旄黄钺定两京，擒充戮窦四海清，二十有四功业成，二十有九即帝位，三十有五致太平。”^⑦白居易还做诗说：“……我有一言闻太宗。太宗常以人为镜，鉴古鉴今不

① 《旧唐书》第17卷《文宗纪·史臣曰》，《二十五史》5，第79页。

② 《旧唐书》第18卷下《宣宗纪》，《二十五史》5，第8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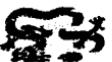
③ 《猗觉菴集记》，上卷。

④ 《杜工部集》第10卷，《重经昭陵》。

⑤ 《杜工部集》第2卷，《杜征》。

⑥ 《刘禹锡集》第19卷，《唐故相国李公集纪》。

⑦ 参见《元白诗笺证稿》第5章。



鉴容。四海安危居掌内，百王治乱悬心中。”^① 白居易还在他写的《为人上宰相书》中说：“于是太宗卒从文贞之言，力行不倦。三数年间，天下大安，戎狄内附。……斯则得其时，行其道，不取于渐之明效也。”^② 肯定了唐太宗对“大乱之后”如何“致理”辩论中的正确决策及其意义。李贺写有《马诗》二十三首，其中一首云：“唐剑斩隋公，拳毛属太宗，莫嫌金甲重，且去捉飘风。”^③ 拳毛骢是著名的昭陵六骏之一，原是秦王李世民平刘黑闼时所乘。李贺还在《致酒行》一诗中写道：“吾闻马周昔作新丰客，天荒地老无人识。空将箋上两行书，直犯龙颜请恩泽。”^④ 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尽管诗人们的赞美诗往往比较具体，后世历代的赞美也各有所据，但我们不可一味地赞誉，而应除去一切灵光，把唐太宗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来考察他的品格、气质。

一、大器早成

有一则似乎带有神秘色彩和宿命意味的故事述说了唐太宗幼时的天资。

“太宗……隋开皇十八年十二月戊午，生于武功之别馆。时有二龙戏于馆门之外，三日而去。高祖之临岐州，太宗时年四岁。有书生自言善相，谒高祖曰：‘公贵人也，且有贵子。’及见太宗，曰：‘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年将二十，必能济世安民矣。’高祖惧其言泄，将杀之，忽失所在，因采‘济世安民’之义以为名焉。太宗幼

^① 《全唐诗》第427卷，《百炼镜·辨皇王鉴也》。

^② 《白氏长庆集》第27卷。

^③ 《李贺诗歌集注》第2卷。

^④ 《李贺诗歌集注》第2卷。



聪睿，玄鉴深远，临机果断，不拘小节，时人莫能测也。”^①

有关史籍还记载，他自幼爱读书，习书法。这些记载虽有神秘色彩或溢美过誉之辞，不尽可信，但说李世民幼年之时是一个聪慧机敏的才童恐不为过，又因他出身于根底很深的军事贵族家庭，崇尚武功，重视军事知识的教育，所以李世民从小就演习弓马，驰骋猎场。他身强力壮，所射的箭，比一般人用的要大一倍，而且武艺精湛，百步之外能“射洞门闕”^②。除操练武功外，还勤于诵读兵书。常读曹操注的《孙子兵法》，据说他对这部兵书能背诵如流，少年时就能用孙子之言和父亲谈论兵策。在这样的家庭环境熏陶下，他自幼便与军事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一个刚烈倔强、骁勇强悍的将帅之才。李世民才华初次显露是在隋大业十一年（615年），解隋炀帝雁门之围。十六岁少年李世民的高明谋划足称身手不凡，初露大器早成的锋芒。

306

二、晋阳起兵前后才智的进一步发挥

如果把雁门解围视作李世民的才智初展，那么，晋阳起兵，便是其才智得到进一步发挥之时。史载：

“太宗为人聪明英武，有大志，而能屈节下士。时天下已乱，……知隋必亡，乃推财养士，结纳豪杰……匿之。又与晋阳令刘文静尤善，文静坐李密事系狱。太宗夜就狱中见之，与图大事。时百姓避贼多入城，城中几万人，文静为令久，知其豪杰，因共部署。计已定，乃因

^① 《旧唐书》第2卷《太宗纪上》，《二十五史》5，第11页。

^② 《酉阳杂俎》第1卷。



裴寂告高祖。高祖初不许，已而许之。”^①

《资治通鉴》也载：“起兵晋阳也，皆秦王世民之谋。”^② 虽然不能据此否认李渊在晋阳起兵中主要策划者的身份，但李世民也是首倡者之一。《资治通鉴》对这次起兵的过程记载为：时当隋末大乱，义军蜂起，促成统治集团内部分化，贵族杨玄感已起兵反隋。公元617年的一天，李世民得知晋阳令刘文静因与农民起义军首领李密联姻而下狱太原，便前去探问。刘文静说：“天下大乱，非高、光之才，不能定也。”李世民纠正说：“安知其无，但人不识耳。我来相省，非儿女子之情，欲与君议大事也。计将安出？”刘文静说：“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围逼东都，群盗殆以万数。当此之际，有真主驱驾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皆避盗入城，文静为令数年，知其豪杰，一旦收拾，可得十万人，尊公所将之兵复且数万，一言出口，谁敢不从！以此乘虚入关，号令天下，不过半年，帝业成矣。”李世民笑道：“君言正合吾意。”^③ 于是暗地部署宾客，进行准备。但又恐怕李渊不从，犹豫许久也未敢言。恰好正赶上突厥兵犯马邑，李渊派高君雅与马邑太守王仁恭合兵迎敌，二将交战失利，李渊担心株连自身，在其忧虑之时，李世民便趁机屏退众人，向李渊分析形势，陈述利害，解除疑虑，终于帮助李渊下定起兵反隋的决心，五月间起兵太原，竖起反隋旗帜。

《资治通鉴》的记载也有合乎情理之处，即李渊初至太原并无反意。因为身为太原留守的李渊是朝廷命官，且负有“讨贼”使命，前不久，由于镇压毋端儿义军奉诏为太原道安

^① 《新唐书》第2卷《太宗本纪》，《二十五史》6，第11页。

^② 《资治通鉴》第190卷，第5957页，武德五年十一月。

^③ 《资治通鉴》第183卷，第5730页，恭帝义宁元年。



抚大使。之后，又镇压了甄翟儿义军，正处于新官上任，刚刚受到重用，意高志满时期的李渊，不可能突然产生反隋之念，在起兵问题上，他的思想自然是保守、犹豫、逡巡不前。而李世民则与他父亲不同。他看出隋室已面临崩溃，“阴有安天下之志”，于是交结了长孙顺德、刘弘基等因避辽东之役亡命晋阳，对隋王朝心怀怨怒的豪杰之士。李世民同这些人结成莫逆之交，甚至外出同乘一马，居家相伴起卧，就连与先前曾有矛盾的窦琮，也因亡命太原而成为好友。他们之所以能走到一起，是靠反隋的思想一致。由此可以证明，李世民虽非亡命之人，但他的反隋情绪久已萌生于心中，故他首谋晋阳起兵是合乎逻辑的。

晋阳起兵后，进军关中时在霍邑遭到隋大将宋老生的拦阻，又传突厥与刘武周乘虚袭晋阳，形势危急，李渊动摇了，想听裴寂等人的意见北返，退回太原。洞察当时形势的李世民再次站出来，对李渊进行有理有据的劝说，指出宋老生是可破的小敌，为图大业，不可放弃“先入咸阳，号令天下”的方针。李渊不听，并促令北返，他便连夜哭谏，痛陈利害，终于说服了李渊。李渊笑着对他说：“吾之成败皆在尔，知复何言，唯尔所为。”^① 李世民在李建成的赞同下，坚持了继续西进的路线，打败了宋老生，攻占了霍邑。李世民不仅屡献良策确保指挥无误，并且奋勇参战，“引兵驰下，冲老生阵，出其背，世民手杀数十人，两刀皆缺，流血满袖，洒之复战。”^② 由于他的率先垂范，将士更加英勇，乘胜继续迂回前进。首先自黄河南下，攻占

① 《资治通鉴》第184卷，第5744页，恭帝义宁元年七月。

② 《资治通鉴》第184卷，第5748页，恭帝义宁元年八月。



永丰仓，然后夺取潼关要镇，长安已成为一座孤岛。李渊军不仅开辟了进取、发展的根据地，军事力量也迅速地壮大了，兵马数量由一万发展到九万。此时又相继有长孙无忌、颜师古、房玄龄等出身于关中贵族的文学才士投向李渊、李世民父子。大业十二年（617年）九月，李世民所领胜兵十三万，军令严整，秋毫无犯，与李建成所领精兵合围长安。很快，李世民攻占并屯驻长安故城，李建成直趋长乐宫。十月，李渊至长安城下，十一月攻克长安，扶助代王杨侑为隋恭帝，遥尊在扬州的隋炀帝为太上皇。618年3月，炀帝在江都被杀，5月，隋恭帝“禅位于唐”，李渊即皇帝位。至此，李家父子正式建立了唐朝。李渊的太原起兵，决定于李世民的审时度势，洞察世态的决策，又在短短六个月的时间里便取得如此胜利，依然是得益于李世民“乘虚用兵，号令天下”的战略方针和多次力挽狂澜，渡过险关的英武行为。

309

三、统一战争中的主帅

隋封建政权被推翻，李唐政权建立之后，在中国广大的地区上分布着十几支大小不等的武装力量：在北方边境上的，有李轨、薛举、梁师都、郭子和、刘武周、高开道等部；在黄河流域的有李渊、王世充、李密、窦建德、孟海公、徐圆朗等部；在江淮之间的有杜伏威、李子通、宇文化及、陈棱等部；在江南一带的有沈法兴、杜弘兴、萧铣等部。这些力量，不管它在前后反隋斗争中所处的地位怎样，此时却都在企图消灭自己近畔的力量，来壮大自己。这些战争在客观上都具有统一战争的性质。依据统一战争性质衡量，凡是作为前一阶段中的打击对象的，如隋朝封建统治的残余王世充、宇文化及以



及企图维护原来豪强割据局面的萧铣、沈法兴等这些力量，是不能够完成统一事业的，必然要被消灭。所以在统一战争过程中，谁打击、消灭了这些力量，谁就对统一有所贡献。割据西北一带的豪族如李轨、薛举、梁师都、刘武周等又都依附于突厥，成为统一的严重障碍。随着统一战争的发展和这些割据力量的消灭，突厥的侵略便逐渐疯狂起来。这样，在统一的过程中，外在矛盾就日益发展成为主要矛盾了。这一来，谁能够打击上述的傀儡政权，谁能够抵御突厥的侵略，谁就对统一有所贡献。李密、窦建德、杜伏威和李渊是这些力量中最大的几个，在发展中，他们之间的力量对比起了变化。这一方面由于各自所具有的条件不同，但对战争指导的正确与否，则又是引起力量变化的重要因素。而李渊在统一战争中之所以取得最后的胜利，是与李世民的中流砥柱作用密不可分的。

从李渊建唐到李世民即位，唐王朝又进行了历时十年之久的统一战争。在此期间，李世民协助李渊制定了巩固关中，出兵西北，然后进占关东的战略决策和行动计划，在西河之战、霍邑之战、浅水原之战、虎牢之战等这些关键性战役中，又都表现出惊人的大智大勇，从而显露出李世民杰出的军事才能。

李世民不仅是卓越的政治家，而且是杰出的军事家。自晋阳起兵后，他就开始了征伐生涯。在攻克长安前的一年里，他是在李渊指挥下作战的；而在武德年间，他独立地进行了四大战役。据统计：从武德元年（618年）六月抗击薛举，至武德五年（622年）三月平定刘黑闼第一次起兵，前后总计四十六个月，而李世民亲自驰骋于战场就达二十七个月，战役之间的休整仅只十九个月。激烈的战争实践大大地增长



了他的军事才能,提高了他的作为军事家的素养。武德九年(626年)九月,唐太宗即位不久,他曾经总结自己的战略战术说:“吾自少经略四方,颇知用兵之要,每观敌阵,则知其强弱,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彼乘吾弱,逐奔不过数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阵后反击之,无不溃败,所以取胜,多在此也。”^①这些经验之谈,是他战略战术的一部分。关于唐太宗战略战术的特点,各家总结不一,已故唐史专家汪篯先生,概括为如下七点:

第一,李世民很善于分析敌我双方的优点和弱点,很善于利用自己一方的优点和敌方的弱点。

第二,李世民能够从战争的全局出发,抓住关键性的问题来制订战略方针。

第三,李世民在寻找战机、捕捉战机和创造战机方面做得非常出色。他对于什么时候打,掌握得很稳很准。

第四,李世民具有冷静的策略头脑,顽强的忍耐精神和当机立断的魄力。

第五,李世民很注意调查研究和掌握敌人情况。他在每次战斗前、战斗中,都要亲自带领少数精骑,深入侦察对方。

第六,李世民很重视乘胜追击,猛打敌人,不让失败的敌人获得喘息的机会。

第七,李世民很善于运用己方的优良兵种,即骑兵。在战事相持阶段,他善于运用精骑来切断敌人的粮道;在主力决战当中,他善于运用精骑突入敌阵或迂回敌后的战术来给予敌方以致命的打击;在敌方溃退当中,也善于运用精骑的

^① 《资治通鉴》第192卷,第6022页,武德九年九月。



高速度来穷追猛打，力求全歼败敌。^①

对于李世民建树的卓越功勋，李渊十分赞赏，他曾下诏说：

“朕起晋阳，遂登皇极，经纶天下，实仗群才。尚书令秦王，右仆射裴寂，或合契元谋，或同心运始，并蹈义轻生，捐身殉节。艰辛备履，金石不移，论此忠勤，宜有别恩。”^②

武德四年(621年)时，还因李世民功高莫名，前代官皆不足称之，特设了天策上将这一官职，位在三公之上。这年十月，任李世民为天策上将，兼领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加增封邑二万户，等于普通王公食邑的两倍，并准开天策府，设置官属。这种特殊恩宠，古来鲜有，足见李渊对李世民的依靠和器重。

312

四、驾驭复杂形势的才智与能力

李世民的过人才智还表现在他驾驭复杂形势的能力上。在他即位的第十二天，斥退突厥颉利可汗，就是一例。突厥的祖先是匈奴的别支，姓阿史那氏，王称可汗，隋唐时分东西两部。西突厥雄霸西域，东突厥虎踞漠北。唐初东突厥的可汗是突利和颉利。隋文帝时突厥曾被击败并表臣服，隋末又强盛。它控弦百万，势凌中原，经常袭扰边疆，抢掠男女金帛，北部边民多受其害。李渊起兵太原后，唐与突厥曾面约和好，李渊赐宴于太极殿，厚赠来使。不料盟誓刚过，突厥复又兴兵来犯。五月间，李渊曾命李元吉点兵迎战，未及出兵，

^① 《汪篯隋唐史论稿》第89~9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② 《唐会要》武德六年诏。



突厥内部发生争斗，颉利可汗下令退兵。然而，刚过三个月，颉利可汗便乘唐廷内乱方息，太宗刚刚即位之时，乘机深入，大军进抵长安郊外渭水便桥之北，并派心腹执失思力入朝，宣染声势，进行威吓。声称：颉利与突利两可汗率兵百万，马上就打入长安。面对此种严重的局势，唐太宗沉着稳健，并未惊慌失措，义正辞严地训斥执失思力：“吾与汝可汗面结和亲，赠遗金帛，前后无算。汝可汗自负盟约，引兵深入，于我无愧！汝虽戎狄，亦有人心，何得全忘大恩，自夸强盛！我今先斩汝矣！”执失思力惊慌求饶，萧瑀、封德彝也建议以礼遣送回去。唐太宗说：“我今遣还，虏谓我畏之，愈肆凭陵。”便将执失思力扣留在门下省。接着部署兵力，准备迎敌。他亲率高士廉、房玄龄等六骑至渭水岸边，“与颉利隔水而语，责以负约。突厥大惊，皆下马罗拜。俄而诸军继至，旌甲蔽野，颉利见执失思力不返，而上挺身轻出，军容甚盛，有惧色。上麾诸军使却而布阵，独留与颉利语。”萧瑀极力谏劝太宗不要轻敌，太宗却解释说：“吾筹之已熟，非卿所知。突厥所以敢轻国而来，直抵郊甸者，以我国内有难，朕新即位，谓我不能抗御也。我若示之以弱，闭门拒守，虏必放兵大掠，不可复制。故朕轻骑独出，示若轻之；又震曜军容，使之必战；出虏不意，使之失图。虏入我地既深，必有惧心，故与战则克，与和则固矣。制服突厥，在此一举。卿第观之！”果不出所料，颉利可汗见其阵势，不知虚实，不敢妄进，当天就派人向唐太宗请和，唐太宗自然同意。第二天，唐太宗又往城西，在便桥上与颉利可汗斩白马为盟，突厥遂引兵退去。唐太宗便桥退兵表现了惊人的大智大勇，连臣下们对这样的冒险也极不理解。事后，左仆射萧瑀询问唐太宗为何面对突厥其势汹汹，兵临城下敢于轻骑而出，当其慑服时反倒与之斩白马结盟



呢？唐太宗解释说：

“吾观突厥之众虽多而不整，君臣之志唯贿是求，当其请和之时，可汗独在水西，达官皆来谒我，我若醉而缚之，因袭击其众，势如拉朽。又命长孙无忌、李靖伏兵于幽州以待之，虏若奔归，伏兵邀其前，大军蹑其后，覆之如反掌耳。所以不战者，吾即位日浅，国家未安，百姓未富，且当静以抚之。一与虏战，所损甚多；虏结怨既深，惧而修备，则吾未可以得志矣。故卷韬戈，唤以金帛，彼既得所欲，理当自退，志意骄惰，不复设备，然后养成伺衅，一举可灭也。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此之谓矣。”^①

唐太宗这番高论极为精彩，其胆识和远见令人拍案叫绝。若不是他计退突厥，唐初政权很难说如此巩固安然；若是他轻应衅端，使刚创立不久的李唐政权陷入强敌的争战之中，很快出现的统一局面与贞观治世都将化为泡影。

便桥化险为夷，唐太宗并未忘乎所以。此后，他潜心加强武备，致力于国富民强，选准了突厥内乱的有利失机，于贞观四年（630年）大破颉可汗于阴山，彻底解除了北方的威胁。唐太宗的才智在著名兵书《李卫公问对》中得到较为集中的反映。此书是李靖与唐太宗谈论兵法的语录，经后人整理成书，现存一万余字，分上、中、下三卷。书中联系唐以前的战例及其两人亲自经历的战斗，参照历代著名兵家的言论，论述了奇正、虚实、攻守、战阵及军制等问题，多为独到见解。如在论证“正”“奇”关系时，李世民提出了“以奇为正者，敌意其奇，则吾正击之；以正为奇者，敌意其正，则吾奇击之”的战术思想，具有很高的军事价值。

^① 上引文均见《资治通鉴》第191卷，第6019~6020页。